

大躍進和「文革浩劫」夢魘何時了？

——建國六十年經濟建設的反思

鄭若龍

據香港《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09年8月8日報導，中國某一位前國家領導人(疑為萬里或田紀雲，皆與趙紫陽過從甚密)為迎接建國六十年周年大慶，(匿名)寫了篇「萬言書」，廣為流傳。此文開宗明義，質問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如何將「長達三四年的大躍進」和「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寫進黨的「六十年的光榮歷史」之中。這顯然並非易事，尤其當人們回想起當年緊跟大躍進後眼巴巴地看着全國餓死了三幾千萬人。文革迫死了多少無辜的高級知識份子和活生生地整死了多少黨國功臣元老，同樣令人痛心疾首。

今日的中國，市面一片繁榮景象，毛時代則灰暗陰沉。這一強烈對比大家都可想像，但恐怕沒幾個人能夠理解，為何毛、鄧一前一後的兩個三十年，其GDP每年平均增長速度的差距並不構成相應的比例。

這兩段悲慘的歷史很顯然牽連到政治與經濟的層面。國外不少經濟學家便時常提到，「大躍進使當年中國經濟發展，倒退了整整十個年頭」。就國內而言，至今仍不時聽到，「文革十年，經濟瀕臨全面崩潰」的說法。尤其是對比改革開放後「飛黃騰達」的經濟表現，更令許多人進而傾向於全盤否定整個毛澤東時代的計劃經濟制度及其歷史。因此，要回顧建國六十年來的經濟建設，首先是不可能迴避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這兩段極為動蕩的歷史插曲的。然而，在切入本文的主題之前，我們還得先就六十年來國民經濟發展作一個總體的回顧，並簡單對比毛治下的前三十年^①和鄧小平掌權後至今的後三十年的相對成就或得失。至於政治層面的問題及其含義，在這篇短文中則只能點到為止，或表而不提。

一 毛治下的經濟完全不能與舉世矚目的改革開放對比嗎？

今日的中國，市面一片繁榮景象，「紅裝素裹，分外妖嬈」。毛時代則灰暗陰沉，商店門前到處是納悶的人龍。這一強烈對比，相信大家都可想像，但恐怕沒幾個人能夠理解，為何毛、鄧一前一後的兩個三十年，其國內生產總值(GDP)

每年平均增長速度的差距，並不構成相應的比例。後者是令全世界目瞪口呆的9.6%；前者也高達6.1%，這兩個GDP增速數字，對如此龐大的國家經濟實體而言，都是世界罕見的歷史紀錄。也許有人會質疑，毛時代可觀的經濟增長速度，統計上應歸因於1950年代初期的「基數」偏低；但是這一論調也同樣適用於改革開放初期的輕工業和服務行業，因為這兩個產業部門在改革開放前，都遭到特意的壓抑，國家的資金與人力資源主要都投入到被視為是關乎未來國富兵強的重工業和國防工業部門。這一點應該是路人皆知的。

要解讀毛、鄧兩個時代「市面景氣」的強烈對照其實不難，只須引用已故哈佛大學伯格森 (Abram Bergson) 教授 (此君是全世界研究蘇式經濟問題的泰斗，美國許多知名教授專家，包括尚在哈佛執教的、研究中國經濟的權威帕金斯 [Dwight H. Perkins]，都是他的學生；筆者四十年前在哈佛以燕京學社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學人身份做博士後訪問研究時，也特意修讀伯格森教授的課，頗受啟發) 的一句名言。他說，對斯大林而言，「鋼是最終產品，而麵包〔反而〕是中間性〔原料〕投入」^②。其意甚明：斯大林窮盡全國資源，大煉鋼鐵，生產所需機械；麵包 (或其他必需消費品) 的生產，其目的主要在於維持工人生命、使其能持續參與煉鋼，而不在於滿足經濟學上所稱人們的「最終消費需求」。很顯然，在中國的大躍進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間，這一個「斯大林模式」的核心理性，幾乎被無限上綱、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境界。

面對改革開放的「皆大歡喜」，還得針對毛時代的經濟發展多說一兩句話，可分三點：

其一，鄧能享用歐美富有的市場，外貿遽然擴充，外資和高新科技得以大量引進，這是以前完全不可想像的。毛則一早便礙於美國的圍堵政策和巴黎禁運協議的牽制，緊接着中蘇長期交惡；無可奈何，只能一意以「自力更生」、靠土辦法搞經濟為榮。

其二，毛時代年均6.1%的GDP高增長率，假如剔除期間前後六年的負增長，即大躍進失敗後的三年 (1959-1961)，以及文革中的三年，包括前期兩年 (1967-1968) 和毛逝世那年 (1976)，應該不比鄧時期遜色多少。當然，有人或即反問，這都不是毛自作孽嗎？客觀上恐怕不能完全這麼說。文革歷史中的那三年，近乎內亂或內戰，比如作為全國最重要的幾個鐵路運輸樞紐之一的河南鄭州市，其貨運在1976年 (毛病重時) 便長時間幾乎完全癱瘓下來。如此這般所造成的嚴重經濟損失，世界上許多國家屢見不鮮。

其三，第一個五年計劃 (1953-1957) 期間，中國的GDP年均增長率高達9.2% (知名已故美籍華裔經濟學家劉大中 [T. C. Liu] 教授重估後的數字也只略低，清華大學胡鞍鋼教授最近在鳳凰衛視《世紀大講堂》節目 (2009年8月22日) 上稱這是經過幾百年長期衰退後偉大的中華經濟復興的歷史新起點)。但可別忘了，1953年1月隨着中央計劃的確立，也便開始實行了糧棉的強迫徵購 (統購) 統銷。1955年夏天，毛獨排眾議，疾風暴雨式地掀起了「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 (農業合作化運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經濟政策和制度的調整，其激進方式與激烈程度，就如1978年後的非毛化 (非集體化、準私有化、私有化等) 運動；但其GDP增長速度，仍幾乎可以媲美改革開放後的歷史紀錄。

動)」(根據當年通過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這應該從1967年才開始)；民營工商業也同時迅速國有化。隨着1956年的「反冒進」，1957年還有晴天霹靂的「反右傾鬥爭」。在那之前的1955年也鬧起了聳人聽聞的「胡風反黨集團」事件，不一而足。那幾年經濟政策和制度的調整，其激進方式與激烈程度，就如1978年後的非毛化(非集體化、準私有化、私有化等)運動；但其GDP增長速度，仍幾乎可以媲美改革開放後的歷史紀錄。何解？

二 「文革浩劫」果真令經濟「全面崩潰」嗎？

當某種制度，不論通過甚麼方式或手段建立起來以及「常態化」後，人們通常都會因循就序，大體上順其自然參與操作。「絕產自斃」或「起義抗暴」等不切實際的想法，恐怕是外界隔岸觀火、幸災樂禍、捕風捉影的結果吧。

再說文革十年，假如剔除前述負增長那三年，年均GDP增長率應該不低於整個毛三十年的紀錄。有關的數據都是改革開放後中國官方重新整理出來的。有趣的是，台灣某國際知名、專注研究中國大陸經濟問題的學者，當看到筆者在〈不可忘記毛澤東：談談毛在改革開放和中國和平崛起的歷史作用〉^③一文中提到此事時，將信半疑之際，竟然以為筆者將包含中間性產品投入(intermediate input)價值的「社會總產值」或「工農業總產值」，誤認為僅包含資本財和最終消費品(即「淨產值」或「累加價值」)的GDP^④。誠然，在工業化進展的過程中，隨着加工產業鏈加速延伸，「總產值」增長勢將超過「淨產值」增長率，這都不在話下。

更有趣的是，大約在1980年代中期或後期，當時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在闡釋文革期間的GDP高增長率時說，雖然有「四人幫」為非作孽，但是廣大工農群眾為了祖國前途或自己的生活着想，還是忍氣吞聲地堅守崗位，努力工作。這在當年批判「四人幫」倒行逆施的浪潮未盡消退時，真令人啼笑皆非。實際上，當某種制度，不論通過甚麼方式或手段建立起來以及「常態化」後，人們通常都會因循就序，大體上順其自然參與操作。「絕產自斃」或「起義抗暴」等不切實際的想法，恐怕是外界隔岸觀火、幸災樂禍、捕風捉影的結果吧。

1970年代中期，中國剛恢復聯合國席位後，歐美許多大名鼎鼎的經濟學家，包括諾貝爾獎得主，都絡繹不絕訪問中國大陸。如哈佛大學的庫次內斯(Simon S. Kuznets，又譯庫茲涅茨、顧志耐)和里昂惕夫(Wassily W. Leontief)，耶魯大學的雷諾茲(Lloyd G. Reynolds，其兒子後來也專注研究中國經濟)等人，回國後對中國的經濟發展策略都有不同的褒辭。當然，本來就是「左傾」的劍橋大學羅賓遜(Joan Robinson)夫人(有人說如果不是「思想」問題，她早已是諾獎得主)，以及史坦福大學的格利(John G. Gurley)教授更是讚口不絕。有曰，當年中國政府善於集中資源於重點建設，不以利潤指標為依歸；有的直指當年譽滿全球的農村五小(重)工業為中國獨特的工業化道路；也有的充分諒解在美國軍事圍堵下，以及蘇聯血洗珍寶島後，毛大聲疾呼「備戰備荒」、「深挖洞、廣積糧」的戰略需要(包括「三線建設」)以及所帶來的高度嚴控的經濟制度與措施方式；等等言論，不一而足。至於早年便「愛情絢麗」(splendid)的知名小說家韓素音

(Han Suyin)，對「文革中國」的「燦爛」觀感，當然很多人都以她不是經濟學家，而一笑置之。

同樣發人深省的是，美國尼克松 (Richard M. Nixon) 總統1972年訪華後，美國參眾兩院的聯席中國經濟聽證委員會邀請了近三十位專家學者撰寫報告；1975年彙集成書發表，題為《對中國經濟的重新評估》(*China: A Reassessment of the Economy: A Compendium of Papers Submitted to the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July 10, 1975*)。許多行內學者讀後，都頗感愕然。1977至1978年筆者以「大學校際協會」(Inter-University Council) 高級院士 (Senior Fellow) 的身份，由香港中文大學訪問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作「休假研究」時，在一次小型研討會上，牛津大學的德籍學者克拉特 (Werner Klatt，已故知名蘇聯和中國問題專家) 便開了美國人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他諧曰，對比1972年尼克松訪華前夕剛付梓的另一本頗富負面訊息的、題為《對中國經濟的評估》(*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 Economic Assessment; A Compendium of Papers Submitted to the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的姐妹作品，行外人假如不看這兩本權威性極高的聽證會報告封面上的「中國」一字的話，還很可能以為它們所涉及的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國家呢！美國學者專家的「政治幼稚病」果真如此嚴重嗎？

三 大躍進大悲劇其來又何自？

筆者1978年在倫敦大學做研究時，遍閱了亞非學院館藏1958至1961那四年中國所有省份的日報，一日無遺；也到毗鄰的大英博物館搜集中國戰前各省各地的各種糧食產量和雨量資料。赴英之前，更在香港天文台取得那四年中國所有氣象台站每日分別以電報傳過來的雨量數據。目的無非想確定大躍進那場「禍亂」的前因後果及事發過程，並對比1930年代，也是江淮流域大規模旱 (1934)、澇 (1931) 交替的年代，探討毛是否果真有通天本領，在和平時期無端造成餓殍遍野。筆者前後花了二十年時間，研究結果已成專著發表^⑤，不另贅述；在此僅及一二，而且礙於篇幅，也只能點到為止。

首先，大躍進鬧得天翻地覆，主要是1958年的事。土高爐大煉鋼鐵始於當年春天，但到年底，就全國而言基本上已經偃旗息鼓。人民公社自8月份北戴河會議正式拍板後，其極端的平均主義和供給制 (公社食堂) 至遲到1959年春夏之交已經迹近湮沒。1958年4月中由湖北 (王任重為省委書記) 麻城縣開始發放的「畝產萬斤」(指早稻) 的「高產衛星」，很快便激起山東 (譚啟龍為省委書記)，尤其是河南 (吳芝圃為省委書記) 等大省急起效尤 (湖南省的華國鋒，時似為省第二把手，年僅三十八，似乎特別謹慎)；但到了年底，毛已經聽聞糧食徵購指標難以落實，而深深地皺起了眉頭。再說1958年的另一陣烽烽火火，即大規模的、

必須指出的是，「天翻地覆」的1958年同時也是個罕見的豐收年，糧食總產破了歷史紀錄。其背景很簡單：不一定是大躍進之下農民「幹勁十足」、「精神面貌特別好」，而是少見的風調雨順年景。

極為勞累的「深耕密植」運動，至遲到1959年春，也就是毛在4月1日親自草擬的「黨內緊急通知」發給各省各級幹部以後，便完全停頓下來了。嚴重誤判的「三三制」（下詳）也同時叫停，說「少種、高產、多收」的做法，目前不切實際。

然而，必須指出的是，「天翻地覆」的1958年同時也是個罕見的豐收年，糧食總產破了歷史紀錄（這是矯正「浮誇風」後的訂正數字，也是改革開放後官方所確認的）。其背景很簡單：不一定是大躍進之下農民「幹勁十足」、「精神面貌特別好」，而是少見的風調雨順年景。那麼，接着而來的大饑荒又何以緣起呢？這裏有兩三個關鍵性的因素：

其一是在「畝產萬斤」的幻象之下，大家都以為中國人兩三千年來的吃飯問題一下子都解決了（筆者懷疑當年8月炮轟金門也如是緣起）。這直接催生了1958年年底「三三制」（現有農耕地三分一種莊稼；三分一種樹種草，發展林牧業；三分一休閒，以培養地力）的出台。

1958年9月底，是劉少奇，而不是毛澤東，根據河北省的「經驗」，親自在報上首次勾畫出這幅令人興奮的美景。廣東省省長陳郁應聲而起，建議將1959年全省的耕地面積從1957年的4,800萬畝下調到3,500萬畝。兩個月後，趙紫陽（時任廣東省委書記）更進一步調低至2,500萬畝；1959年的早稻播種面積也由3,800萬畝下調到只有1,800萬畝。如此天大減幅，誠令人不寒而慄、匪夷所思。雖然後來中央領導人也說「三三制」主要是一幅遠景藍圖，但在大家急起追趕先進的大躍進之下，其直接後果是1959年全國播種面積顯著減少，糧食總產量也明顯下降。

其二是1958年冬至1959年春政策陸續調整後接踵而來的大面積水旱災害，由1959年夏一直延伸至1960年全年大旱（沿海個別省份因一連幾個強颱風所造成的洪澇災害除外）。到1961年中才見甘霖陸續而來。另一個也可列為重要因素的是1959年秋收時，因為批鬥彭德懷所再次掀起的「左傾冒進」和「高徵購」風。這使農民在受災減產之餘，更形入不敷出，許多地方農民被迫透支飼料和種子糧充飢，造成耕畜死亡和播種不足，結果在鋪天蓋地的天災人禍之下，1960年全面大幅度減產；至1961年糧產才開始穩定下來。然而，1960年中開始，遍地炎黃子孫，已經嚴重水腫浮腫，坐以待斃；緊接着是黨中央11月初緊急發出十二條救亡或農民自救的指令。這也都是歷史了。

外界談到這一場空前絕後的大劫難時，都不免樂於傾聽彭德懷（萬言書）「出乎良心」的諍言；尤其是「七千萬人上馬，土高爐煉鋼煉鐵，荒廢農耕」這些話。但是，熟諳當年事發前後時序的人，相信都不會忽略毛在廬山會議上的咆哮。他吃了安眠藥還不能入睡後，直罵彭德懷在1958至1959年冬春之交幾次重要的中央會議討論政策如何調整時，全不「吭聲」（毛澤東語），等到上了山才發難。看來毛對「事後孔明」沒甚麼好感，才會不時鑄成大錯。更令人難堪的是不少知名學者，就如本文破題時所指的「新萬言書」中，也都有意無意地將那幾年（1958-1961）混為一談，直指大躍進（嚴格說應指1958年）是人間煉獄，破壞工農群眾情

外界談到大饑荒這一場空前絕後的大劫難時，都不免樂於傾聽彭德懷（萬言書）「出乎良心」的諍言；尤其是「七千萬人上馬，土高爐煉鋼煉鐵，荒廢農耕」這些話。但是，熟諳當年事發前後時序的人，相信都不會忽略毛在廬山會議上的咆哮。

緒，也令人筋疲力竭，似乎連鋤頭都拿不起來，等等。以前尚有所謂天災人禍「三七開」或「七三開」的爭議，現在則完全變成百分百「毛禍」的統一口徑；只剩下天安門城樓上的「毛像」絲毫無損，何解？

1958年漫天「高產衛星」，直接誤導中央政治領導人的決策和計劃當局的運作，破壞嚴重，不在話下。但是，這「畝產萬斤」的天大謊言和笑話究竟如何形成？筆者在一部著作中只談及其傳播和急速擴散的過程；但也說到，從大眾傳媒研究學的立場看問題，其神秘的「創世記」，至今仍然難以破解^⑥。諾獎得主英籍印度裔經濟學家森 (Amartya Sen) 借題發揮，說這正好見證在沒有新聞自由和民主權利相互制衡的情況下，獨裁政權可造成萬劫沉淪。此處犯不着與這種弦外之音糾纏。

筆者只記得當年見報，湖北省領導人放出麻城「高產衛星」時，說明在田頭收割莊稼、過秤及入倉時，都有許多記者公開見證和量度有關農田四周方圓大小，報導栩栩如生。二十年前筆者應邀在悉尼市麥夸里大學 (Macquarie University) 創辦「中國政治經濟研究所」時，研究所的贊助機構澳洲外交與貿易部安排王任重 (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 到訪。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真想開口窮究當年湖北麻城的底細；但那到底是外交場合，不便於學術交流，也礙於顏面，免其為難，最後只恭請這位有名的書法家為研究所題寫一幅所名的橫額；雖然事前並沒有告知他紙張的寬長尺寸，但是這位老人家依然揮筆自如，誠高手也。

埃克斯坦所謂「大躍進操之過急」，在筆者看來，應該具有兩個不同層面。問題不見得在於所謂「筋疲力竭」，否則當年農民如何揮舞鐮刀，不斷彎腰，開開心心地搶割1958年一片片豐收的稻田麥田呢？

四 「毛禍」夢魘最終應何以了之？

美籍猶太裔的埃克斯坦 (Alexander Eckstein) 教授 (歐陸移民、已故；當今美國許多中國研究大師，如拉迪 [Nicholas R. Lardy]，都出自其門下) 雖然也說大躍進令農民「筋疲力竭」，但在事隔將近十年之後，他總結說，大躍進所代表的是一整套適應中國國情的「斯大林模式」的經濟發展策略。當年幾乎將整個工業部門，完全轉化為一個「投入—投入」(input-input) 的經濟，而農業部門則成為一個「投入—投出」(input-output) 的經濟，為工業部門所需的投入 (糧棉煙草等) 而生產，但基本上又得不到工業部門的任何 (如農機、農藥、化肥等的) 支援。後者則實際上陷入了一個由鋼鐵到機械再到鋼鐵生產的不斷的循環過程。他說，相對於毛加速工業化的藍圖而言，這政策 (姑稱之為「埃克斯坦模式」) 本身無可厚非，只是操之過急^⑦。

筆者當年在哈佛訪問時，也適逢埃克斯坦教授從密歇根大學前來做「休假研究」。我們都參與了帕金斯教授主持的博士生研討班，多有所交流。兩年後，也是他兼任美國全國中美關係委員會主席時，將美國的乒乓球隊送到了中國。埃氏的學術生涯雖然緣起於加州伯克利大學，但是他的治學態度、思想背景，尤其是思維方式、研究方法，以及行文風格，瑰麗中見嚴謹，使筆者這個在

德國留學了六年的後學，深感共鳴。在方法論方面，尤其令人想起了德國幾位劃時代的大師，如韋伯 (Max Weber)、宋巴特 (Werner Sombart)，以及稍後的歐根 (Walter Eucken，德國戰後自由主義學派的圭臬、西德經濟復興奇迹的精神導師；他最得意的門生韓斯爾 [K. Paul Hensel] 是筆者留德時的博導教授)。另一句題外話：埃克斯坦教授在那不久之前，也和哈佛的楊聯陞教授 (香港新亞書院學長余英時教授的博士導師) 合著了一篇有關中國經濟的歷史背景的長文，可見他對中國經濟史也有相當的了解。

可以想像，當年許多領導元老，或出於惻隱之心，或有不同的政策構想，都不敢苟同於毛「抓革命，促生產」的做法。可以肯定，劉少奇與鄧小平的想法，便是「欲擒之寧縱之」、或曰「蔣費模式」中的「韓尼巴迂迴戰略」。

話說回頭，埃氏所謂「大躍進操之過急」，在筆者看來，應該具有兩個不同層面。問題不見得在於所謂「筋疲力竭」，否則當年農民如何揮舞鐮刀，不斷彎腰，開開心心地搶割1958年一片片豐收的稻田麥田呢？有關第一個層面，首先得先從1957年冬全國農村所掀起的水利工程建設高潮 (這方面已故的奧克森伯格 [Michel Oksenberg] 教授——即曾任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要職、參與中美建交談判的政治學者，呈交給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論文有詳盡介紹)，以及1958年1月南寧會議後所展開的農業工具改革運動說起。這兩起「支農」高潮所帶動的大規模勞力動員，強有力地推動了剛剛由「反冒進」喘定過來的高級農業合作社，轉向「併社」、成為人民公社的另一個高潮。這些或是老生常談，但更有意思的是，農具革新 (需用鐵用鋼) 促進土高爐遍地開花之際，其目標卻很快地便由「支農」轉向全面地支援鋼鐵工業實現有名的、也是8月中北戴河會議確定下來的1,070萬噸的宏偉指標。這是「埃克斯坦模式」的登堂入室。後來的紅旗渠 (下詳) 以及文革時的農村五小 (重) 工業 (鋼鐵、機械、水泥、化肥、能源 [含小煤窯和小水電站])，可謂與此一脈相承，只不過其「實質」支農的目的，也無非在於創造更大量的「農業剩餘」產品，全額支援重工業的加速發展。

「埃克斯坦模式」的另一個層面或可說是「蔣費模式」 (Chiang-Fei model) 的概括。此模式取名於兩位世界著名的美籍華裔經濟學家蔣中一 (Alpha C. Chiang) 和費景漢 (John C. H. Fei) 教授。蔣先生是筆者五十年前在新亞書院唸書時的經濟學啟蒙老師，這幾十年來也一直有幸當面聆聽教益。他早年提出的「蔣費模式」，也一直是筆者解讀中國經濟問題的一個重要的理論基礎^⑥；唯每次都惶惶恐恐，但願不曲解蔣老師原意。「蔣費模式」的核心觀點是區分蘇式經濟中兩種基本政策的差異及其效果。其一為「極限式」的壓抑所得和消費 (maximum austerity)，以期總體儲蓄及投資的極大化，帶動經濟的「極速發展」 (maximum-speed development)；其二是與之對立的「適度式」的低所得和消費 (optimum austerity) 政策，即借助「物質誘因」激勵更高的有效勞力投入，以期總產量相對於國家提供給工人和農民的「額外」消費支出而言，作「超比例」增長；如此則雖然短期內因為消費增加導致儲蓄與投資量下降，但長期而言，更易於推動經濟高速發展。前一個論點顯然有「欲速不達」的涵義；後一個論點則類似秦漢之間的北非迦太基帝國名將韓尼巴 (Hannibal Barca) 繞道阿爾卑斯山南下直逼羅馬、或列寧「取道印度的加爾各答 (代表被剝削的殖民地國家) 進攻羅馬 (代表資本主義國家)」

的「迂迴戰略」。這兩種論點在實踐上的可能操作方式以及效果如何，筆者在另一專著中有較為詳盡的分析^⑩，不另贅述。

毛時代的政策是否果真「欲速不達」姑且不論，但不爭的事實是在大躍進發生的1958年，全國的儲蓄率已遠超過40%的「極限」。事實上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年均儲蓄率（約近25%）也已經遠遠超過發展經濟學家羅斯托（Walt W. Rostow）認為低所得國家「經濟起飛」所必須的12%^⑪。可別忘記，文革期間全國儲蓄率大多數年份都維持在30至35%之間。這對「一窮二白」的中國人民而言，所必需的生活和消費，顯然已經被壓抑到了最低的生存極限。除口糧與漏屋外，恐怕連牙刷也闕如（毛便說自己是「老虎不刷牙」^⑫）。上一代的人也都還記得，當年全民男女的衣着，不外乎黑灰兩色的毛裝，別無選擇。農村每年冬閒搞水利建設，擴建高產穩產田，基本上也是赤手空拳，戰天鬥地。1969年完工的、號稱「世界第八奇蹟」的紅旗渠，也就是如此這般地在「無償」、「強制動員」之下搞出來的。相信當年參與勞動的中原遺民如果說那是「光榮任務」，外界許多人也不會認同的。

可以想像，當年許多領導元老，或出於惻隱之心，或有不同的政策構想，都不敢苟同於毛「抓革命，促生產」的做法。可以肯定，劉少奇與鄧小平的想法，便是「欲擒之寧縱之」，或曰「蔣費模式」中的「韓尼巴迂迴戰略」。這一個被「四人幫」猛烈炮轟為「市儈哲學」的「物質刺激」辦法，當然與毛透過政治掛帥或道德游說、鼓起幹勁的暴雨式的動員，是水火不相容的。很可悲的是，這「兩條路線」的政策爭議，終於演變成文革期間大規模的政治鬥爭和迫害。但這些也都已經是歷史了；再糾纏下去，毫無意義。

文革大動亂，尤其是大躍進嚴重失誤（浮誇風、「三三制」、高徵購）所造成的曠世悲劇，必然讓人頓首捶胸跪地，泣問茫茫上蒼，究竟「誰主浮沉」！但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這又恰似一次怒海翻舟、出師未捷；可悲，熟不可悲！

五 結語：歷史誠可悲也

自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在「埃克斯坦模式」（持續性、極限式的壓抑消費、強制儲蓄、加強投資、為重工業而生產）的急速工業化之下，到了毛「圓寂」時，工業部門所創造的產值在中國GDP中所佔比重已將近一半（1952年僅為21%，1978年顯著地上升至48%）。這徹底改變了以農業為主的國民經濟結構，也使工業部門基本上開始擺脫了「農業牽制」（agricultural constraints），成為一個相對獨立和自我提升（self-augmenting）的產業部門。同時，不斷地搞「紅旗渠式」的農村基本建設（或曰「努克思式」[Nurksian]的資本積累^⑬），也基本上解決了幾千年來的溫飽問題。這一「功績」得來不易，也為改革開放奠定了強大的物資基礎，帶動中國經濟由「粗放式」轉入了「集約式」的歷史性發展階段。這一點筆者在〈不可忘記毛澤東〉一文中已有較詳細的闡釋。

文革大動亂，尤其是大躍進嚴重失誤（浮誇風、「三三制」、高徵購）所造成的曠世悲劇，必然讓人頓首捶胸跪地，泣問茫茫上蒼，究竟「誰主浮沉」！但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這又恰似一次怒海翻舟、出師未捷；可悲，熟不可悲！

跋：〈不可忘記毛澤東〉一文於2008年年底發表後，即時有人(匿名)借稱許有關刊物是「學術性報刊，崇尚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以討取篇幅，並借題發揮，猛將毛再度挖出來，鞭屍八百，而仍有餘恨。其中有一篇用詞之慘暴、低俗，非一般讀者可以思議，而且直令當年紅衛兵「鬥批劉鄧」的大字報黯然失色。更可悲的是，那兩篇完全談不上有任何學術內涵或水準的「回應短文」，也竟然避過了那份屬於人稱有強烈的「自由民主」傾向和某些「學術」性質的報業集團的財經雜誌主編的視野。這則更令人心寒之餘，莫測高深。然而，這也使筆者感覺到有需要再寫這篇文章，以進一步補充筆者所指的毛的「歷史作用」。請留意，筆者在前文標題中是用中性的字眼，指毛的「歷史作用」，而不是「歷史功用」。那兩個紅衛兵式的「文壇」屠夫，可能沒看清楚，也顯然不想懂歷史。奈何？

註釋

① 毛的「三十年」主要指從1952年(即國內經濟開始從國共內戰恢復起來)至1978年(即包括衷心堅持「兩個凡是」的華國鋒治下的那兩個毛逝世後的過渡年份)。

② 詳見Y. Y. Kueh, *China's New 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y: Was Chairman Mao Really Necessary?* (Cheltenham, U.K.; Northampton, MA, USA: Edward Elgar, 2008), 117, 135。

③ 郭益耀：〈不可忘記毛澤東：談談毛在改革開放和中國和平崛起的歷史作用〉，《信報財經月刊》，2008年12月號，頁40-48；另轉載於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的《新亞生活》，2009年1月號，頁26-31。

④ GDP的中文譯法，一般為「國內生產總值」(香港譯為「本地生產總值」)。字面上確實容易令人誤以為是等同「毛額」(gross value)的「社會總產值」或「工農業總產值」。

⑤⑥ Y. Y. Kueh, *Agricultural Instability in China, 1931-1991: Weather, Technology, and Institu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Clarendon] Press, 1995; reprint 2002).

⑦ Alexander Eckstein, *Communist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Foreign Trade;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New York: McGraw-Hill, 1966).

⑧⑨ 詳見Y. Y. Kueh, *China's New 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y*，尤其是第一章「如何解讀文革經濟學」。

⑩ Walt W. Ro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⑪ 這出自毛的保健醫生李志綏的憶述。毛長期抽煙，牙齒變黃，李勸他刷牙，據說毛如是回應也。李氏後來暴斃於美國芝加哥市寓所，有人說或因他出言不遜，毛死後也不放過他。

⑫ 愛沙尼亞籍經濟學家努克斯(Ragnar Nurkse)一早認為經濟落後國家缺乏資金，可借用勞力動員，建設基礎措施，如灌溉工程；這等於是實質或有形資本(設備)的累積。

郭益耀 退休經濟學者，教授；現任香港(私立)珠海學院商學院院長、香港城市大學經濟與金融學系講座級客座教授。